

90 长征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档案文献里的长征记忆(一)

三军过后尽开颜

杨仲达



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旧址。

以及《晋阳日报》等几种。报纸当日即送达红一军团指挥员,经聂荣臻转呈毛泽东、张闻天等。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在她的回忆录中有一章题为《长征: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提到哈达铺的时候她这样写道:

“大约是九月二十一日(应为二十日)的上午,我们到了哈达铺,这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小镇。在两天之前,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他们确切地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真是喜从天降。”

刘英是长征的亲历者,她的回忆录为长征的这一段过往留下了珍贵、鲜活的历史记忆,比后来出现的传记、小说写得更为精彩和准确。

当时,红军所获的《大公报》并非一张报纸,而是数份,刊载红军信息的是7月23日、29日、31日和8月1日等几天的报纸。

9月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组成陕甘支队的决定和将向陕

甘革命根据地进发的消息。他在会上还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毛泽东所说的“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也是口语泛指,因为《大公报》并不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敌人也未将其视为机密,而它却向全国传递了红军北上的消息,也给红军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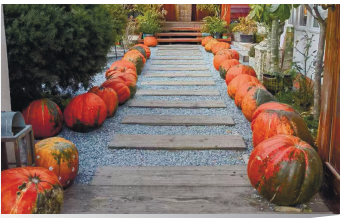
和毛泽东一同居住在义和昌药铺的张闻天在当日写了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揭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做了介绍并分析: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没有红军或游击队的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一万多支枪,下面还有十四个游击支队;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三千,于7月中旬从甘南胜利突围,转移到了陕甘交界处活动;甘南之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张闻天的文章刊登在9月28日中央前敌委员会与陕甘支队政治部出版的《前进报》第3期上,此前一天,中央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去保卫与扩大苏区根据地。而在9月29日红军进占通渭县城的当晚,毛泽东在城东文庙街小学陕甘支队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当众朗读了他的《七律·长征》。

这首诗后来经过修改定稿,1957年在《诗刊》发表,1963年出版单行本的时候创作时间标注为“1935年10月”。这也意味着是把它作为长征总结之作。在停留哈达铺仅间隔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吴起镇会师。

天津与哈达铺远隔关山一千多公里,虽然《大公报》当时全国发行约4万份,但是西北边远小镇的分摊肯定极少。在哈达铺邮政代办所,它的订数能有多少呢?那么究竟是谁订的这份报纸,是邮政代办所的王姓商家,还是其他店铺,史无详载,现已无从考证了。一份《大公报》对长征有极大的影响,没有这份《大公报》提供的消息,长征的路线也许还会更加曲折、漫长。

秋收万颗子

甘武进



秋分,带着成熟的韵味,携着丰收的气息,就这样悄然降临人间。“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好歌好稻栽。”广袤的田野上,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饱满的颗粒紧紧相依,似在诉说着一季的辛勤耕耘与满满收获。阳光轻柔地洒落在稻穗上,泛起耀眼的光金。父亲带我去了稻田间,开始喜悦地收割。左手抓住一大把稻秆,右手镰刀挥舞,“嚓嚓”“嚓嚓”数下,稻秆与地面分离,左手摆向身后,松开,稻秆就整齐地被铺在稻茬儿上了。如此反复动作,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上衣,手臂和腰背也酸痛不已;稻谷的叶子和芒刺划过皮肤,带来阵阵刺痛……但是,我们累且快乐着。那些割下的沉甸甸的稻谷,是庄稼人的宝贝呀!

我看到父亲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是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感恩。“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果园里,也是一片热闹非凡的丰收景象。我开着三轮车,带着儿子去了梨园。剥开套着的纸皮袋,黄澄澄的梨子挂满枝头,圆润饱满,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把表皮最为金黄的那个梨摘下来,咬上一口,甘甜的汁水瞬间在口中漫溢开来,让人回味无穷。

拿出剪刀,我们开始采摘。那些黄

澄澄的梨子被我们放进了水果网套里,放进了水果筐里。一棵梨树上的梨子采摘完了,筐里的水果也装得满满的。我们又去了葡萄园。那里有父亲带着我亲手种下的200多棵葡萄树。我们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协助管理,大棚内的葡萄枝蔓挂在铁线上,成熟的葡萄紫得深邃、绿得透亮,红得灿烂,闪烁着诱人的光泽。轻轻一嗅,果香浓郁,让人心生欢喜。

院子里的柿子也红了。枝条上挂满一簇簇橙红的柿子,把树枝压弯了腰,小院里充满甜蜜的气息。父亲搭上梯子去摘柿子。母亲说,要把树枝顶部的柿子留一些,等它们熟透了再摘下来吃,会更软更甜。其实,那些留在枝头的柿子我们从没摘过,都留在那里由鸟雀啄食了。母亲说,冬天没什么虫子,鸟儿过冬难啊,那些柿子留给鸟儿过冬吃。树顶那些留着的红柿子,饱含着父母的善良和他们对生命的敬畏。

“秋分到,南瓜俏。”我随母亲来到田间地头。南瓜躺在地上。有的金黄,有的墨绿,为丰收的画卷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红薯地里,我带儿子用锄头翻开泥土,露出一个个紫红色的红薯。玉米地里,玉米秆上挂满饱满的玉米棒子。我们扒下来,放进竹篮里,倒进路边的三轮车车厢里,运到家门前的晒场上。

晒场上,红辣椒色彩鲜艳。那一串串红辣椒整齐地排列着,仿佛是一片燃烧的火焰。阳光洒在上面,红彤彤的颜色更加艳丽。辣椒有的细长,有的圆润,形状各异,却都散发着浓郁的辣香。微风拂过,辣椒轻轻晃动,好像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为秋日增添了一抹绚丽色彩。这片红辣椒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更是父母辛勤劳作后的丰硕成果。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农民们的节日。秋分时节的丰收,不仅是物质的富足,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在经历春耕夏耘之后,我们终于迎来秋的收获。这份收获,是对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粮食和瓜果,我们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慷慨与厚爱,更能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小火慢炖

高低

那只砂锅。古人讲“慢工出细活”,《菜根谭》里也说“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原来这炖汤的道理,早被先哲们说透了。苏轼被贬黄州,在东坡开荒种地,慢悠悠地研究“东坡肉”,用慢火煨得“色如玛瑙,入口即化”;齐白石画虾,六七十岁时求形似,80岁后得神似,几十年观察虾的游姿触须,一笔一笔“磨”出功夫。

前年去苏州拜访做苏绣的老艺人,绣架上绷着《猫蝶图》,猫毛根根分明,蝴蝶翅上鳞片泛彩。她说:“少则三月,多则半年。猫眼用12种深浅灰线,层层叠上才显神采。”她指了指墙上的字:“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慢绣’出品,急织无好纹。”那一刻,我又想起母亲的砂锅,原来最深的功夫都在“慢”里。

去年单位接了个项目,年轻人急于出成果,方案改

自从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甲骨学已经有百余年历史了。如今的甲骨学研究,经过几代学人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已然成为一门重要的国际性显学。但关于甲骨文发现于哪里、是由谁发现的、发现途径为何等基础而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长期存在争论。这在众多甲骨学研究课题之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甲骨文发现研究的综述

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分歧极大,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广慧、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后面几说,证据不足,多不成立,不值一辩,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广慧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几个人物,包括王懿荣发现说,王襄、孟广慧发现说,王懿荣、王襄和孟广慧共同发现说即所谓两说兼顾(或称三人发现说)等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两说兼顾说,并非骑墙之论,而是一种在审视了众多相关材料之后所作的慎重判断。相对而言,单持王懿荣说或王襄、孟广慧说,则各有偏于一端的面之嫌。

对于甲骨文发现的时间,也因为发现者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计有:秦汉时期古代、1899年前二三十年、1890年、1894年、1897年、1898年、1899年等几个不同的说法。前几种说法,均证据不足,不能信据。目前可以讨论的发现时间就只剩下1898年和1899年两个年份了,分别“系”于王襄、孟广慧发现说和王懿荣发现说之下。

甲骨文与天津(一)

关于甲骨文发现诸说的评议

朱彦民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方式或说发现途径,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是王懿荣吃中药发现甲骨文说;其二是通过古董商介入由王襄、孟广慧、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说。

二、对王懿荣吃中药发现说的评议

到目前为止,王懿荣因病吃药而发现甲骨文,是社会上、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个认知。不管是相关学术著作,还是大中小学历史教材,大都是这样讲述的。不过这个影响最大的说法,细究起来还是大有问题的。

虽然早期甲骨学著作对王懿荣较早收集甲骨文的事迹也多有记载,但多缺略不详。王懿荣作为一个清末最负盛名的金石学家,他有写日记的良好习惯。现在关于他的文集和日记,也都已陆续整理出版;然而在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中,竟然找不到任何关于他因购药而偶然发现甲骨文的记载。这种关键性证据的缺失,使得“吃药发现说”显得根基薄弱。若真有如此轰动之事发生,以王懿荣对金石学的痴迷及记日记的习惯,断无只字不提之理。因此,这一广为流传的故事极可能是后人附会或误传,缺乏确凿的史料支撑,其可信度值得重新审视与商榷。而事实上,这一传奇故事的源头并非出自当时当事人的记录。

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文的完整故事,最早是1931年一个笔名叫“汐翁”的人,在《华北日报·华北画刊》发表的《龟甲文》一文中讲述的。文中说道,刘鹗到北京来时,住在王懿荣家里。正赶上王懿荣患疟疾,要服用“龙骨”。家人在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买来了中药“龙骨”。刘鹗见“龙骨”上有契刻篆文,于是拿给王懿荣看,当时二人都十分惊讶。因王懿荣本是金石学家,精通铜器铭文鉴赏,认为龙骨上刻有文字,觉得应该是古老的东西,于是派人到药铺,买下刻有文字的“龙骨”。这样,一个生动有趣的关于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文的故事就流传开来,尤其是经过甲骨学家董作宾的引用,影响扩大,以至于今。

然而“汐翁”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而是一个“万金油”式的业余文化人,也是道听途说的小报记者。他的观点直到今天还影响视听,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汐翁”这篇文字的原貌,如今也已难得一见。有些学者比如天津的李鹤年先生,曾花大力气查找这篇“汐翁”的“大作”原文,很难如愿。前些年天津甲骨学者任秉坚先生辗转托人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中复印到了这篇《龟甲文》原文,不到四百字的短文,竟然有多处文字错误。李学勤先生据此撰文,指出汐翁文的种种虚妄之处,认为他为文极其随意,批评其所说的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文的故事,至此,此说已经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

实际上,这个影响较大的王懿荣吃中药发现甲骨的说法,除了这样一个出处令人怀疑之外,还有许多疑点和漏洞,不能令人信服。

比如,在这个故事中提到了王懿荣是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铺买的“龙骨”,但是,根据学者们的考察和研究,北京菜市口在清朝光绪年间并不曾有过达仁堂中药铺,天津学者李鹤年就曾专门为此调查过。北京当时并无达仁堂,达仁堂最早是在天津开设的。而菜市口外的药店是至今犹存的六百年老字号鹤年堂。在这个故事文本里,王懿荣是在买回家的中药里发现甲骨文这种古老文字的。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根据早期有关甲骨文发现的文献记载,当初河南安阳小屯村民卖龙骨到药店时,要把上面的字道用刀刮削掉,因为药店认为带字之骨不吉利,拒绝收购。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即村民无意将一版没有刮掉字道的龙骨卖给了药店而这版甲骨恰巧就被王懿荣买到了,于是在上面发现了甲骨文字呢? 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按照常规,药店卖药是将“龙骨”捣碎并研成粉末,并不卖块状药,因此王懿荣几乎不可能见到整块的龟板。

另外,王懿荣家在王府井一带的锡拉胡同,与宣武门外菜市口隔着皇城,绕城步行颇费周折,而王府井附近就有中药店,王懿荣家人没必要走那么远买药。从以上种种情形来看,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文的故事和由此而形成的一些学术观点,都应该予以重新考量。

当然,王懿荣较早发现甲骨文的观点,也不能因为这个故事的虚假而轻易否定。因为在早期甲骨学著作里,如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著作序言里,都提到了王懿荣较早收藏甲骨文的史实。他们都是治学严谨的学者,自然不像信口雌黄的汐翁,所以这一说法仍然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人生中总有一些事让人难以忘记。我的小说《积极叔》完稿后,先向某省文学刊物投稿,被退稿;再投稿,之后在《当代》1980年第一期发表。此事虽已过去46年,却是我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的事。

1979年,我在铁道兵沈山线羊圈子生产基地服役,任连部文书。文书的日常工作规整有序,白天处理连队各类公文,待到深夜营房熄灯后,便可以有一段完整、不受打扰的时间读书写作。部队驻地的环境相对闭塞,但报纸、内部读物源源不断推送着全国各地社会变革的信息,千里之外湖南老家乡村发生的种种新变化,时时牵动我的心绪。我隐约感到,社会生活可能要迎来巨大转变,乡村众生百态、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社会转型之际,我熟悉的这些人物的命运会如何? 借着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我伏案写下短篇小说《积极叔》。

稿件完成后,我依照当时通行的投稿方式,将手稿整理誊写妥当,寄往某省一家文学月刊,充满忐忑,又满心期待作品能够刊发。可两个月过去,等来的却是一纸退稿通知。编辑部回信称稿件“不合用”,同时勉励我继续努力创作。

在此之前,我已多次在省级刊物发表过小说、散文,一次退稿并未动摇我小说创作的信心。而那时,我偶然读到了关于秦兆阳先生论现实主义的文章,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与我创作《积极叔》的初衷不谋而合。那时我只知晓秦兆阳是享誉全国的文坛前辈,既不清楚他供职的单位及通信地址,更不知道他主持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编辑工作。思索再三,我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坦诚诉说了自身的创作、思考,连同完整的《积极叔》手稿一同寄往北京的一家报社,恳请报社帮忙转交秦兆阳先生,希望能得到前辈的指教。

当年邮政送信速度没现在这么快。我的部队驻地在辽宁省锦州以北,如果信件从军营寄往在北京的报社,再由报社转送秦兆阳先生;先生读完万字手稿、写信后再寄回连队,整套流程走完,正常至少需要半月。但令我万分意外的是,信件寄出仅一周,我便收到秦兆阳先生11月28日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寄来的亲笔回信。先生在信中对《积极叔》一文给予高度肯定,他的点评令我铭记至今:积极叔“这种人物,在农村干部中确实不少,我是见过的。其实在城市里,机关、工厂、学校里也不少,只不过表现形态略有不同罢了”。先生一眼看出,我笔下的“积极叔”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城乡各行各业,都能看见这类人物的身影。在信中,他同时告知我:“我已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估计下月上旬即可发表,但要到明年3月才能出版。”

展读来信,我欣喜难抑。一名驻守部队的业余创作者,稿件经由报社费心转送,又能获得文坛大家亲自审读、亲笔复信,还提前告知刊发安排,这样的际遇,让人几乎难以想象。秦先生的认可,不只是让一篇普通习作得以发表,更是对我坚持书写真实生活、刻画复杂普通小人物创作道路的莫大鼓舞。几个月后,《当代》杂志1980年第一期面世。捧着带有油墨香的刊物,我心中满是对秦兆阳先生的深切感激。

这篇小说在国家级文学期刊《当代》的发表,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创作方向。1980年1月,我退伍回到湖南家乡,之后赶上湖南省“文革”结束后首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召开。凭借《积极叔》的刊发成果,我以省文联、省作协双重正式代表的身份参会,有幸结识了省内大批作家与资深文学编辑。1981年12月,《积极叔》荣获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此后十余年间,我笔耕不辍,陆续在《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湖南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小说多次在省内外获奖。最近,我有几部中篇小说还被建议改编为音乐剧、电影,以为更多的受众服务。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投身剧院建设与经营改革探索。一路走来,历经诸多起伏坎坷,可每当想起《积极叔》刊发的这段往事,便觉自己何其幸运,也由衷感慨那个年代文坛纯粹热忱、惜才扶新的温情氛围。

46年前我的小说得以问世的经历,不仅是我个人一段珍贵的文学机缘,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新人破土成长的微小缩影。2026年,恰逢秦兆阳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我谨将这段尘封心底的文坛记忆分享给广大文学同道,以此遥寄对秦兆阳先生绵长的敬意与怀念。

第五四九〇期

满庭芳

秦兆阳先生给我的帮助

刘小兵



沾上丛话

了七八版,客户仍说“差点儿意思”。我提议学“小火慢炖”,先扎实调研,把每个细节磨透。大家花了两周跑市场,数据详细分析,方案改到第十版,连标点都反复推敲。客户看后沉默许久:“这方案像老汤炖出来的,有温度。”项目成功后聚餐,我举杯:“这杯敬‘慢’——慢不是懒,是把心沉下来,把事做透。”

如今母亲的砂锅还在用。我每次回家,她总爱炖一锅汤,小火煨着,我们在桌边聊天。汤香里浮起“慢”时光:母亲纳鞋底的身影,苏轼爇肉中的灶火,绣娘穿针的专注。原来人生最醇厚的滋味,不在大火快炒的浓烈,而在小火慢炖的绵长。急火可煮熟熟食却炖不出灵魂,快节奏能成事,有时却做不出境界。

锅里汤还在咕嘟,像时光在轻轻呼吸。我忽然明白,所谓“小火慢炖”,炖的是对世事的耐心,是对美好的敬畏。《围炉夜话》说:“粗粝能甘,必是有为之士;纷华不染,方称杰出之人。”慢下来,才能尝出生活的真味;沉住气,才能熬出人生的“浓汤”。